

有力社会:共享经济时代 就业的社会学解读

焦若水^{1,2}

(1.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2.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就业是经济的风向标。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预示着弹性就业时代的来临,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共享经济与就业关系形成三种观点:共享创造工作、共享毁灭工作以及共享导致就业替代交叉。文章立足我国共享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析发现,共享经济对我国就业体系的冲击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导致大量低技能劳动者失业,二是共享经济领域多为弹性就业,就业脆弱性高,三是共享经济对社会保障体系造成挑战。共享经济对就业的冲击的主要症结是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和资本裹挟下的市场进行对话的社会,对劳动者基本权益进行保障。缓解共享经济带来的就业危机,必须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力社会的平衡。

关键词:共享经济;弹性就业;有力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8)06-0108-10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18.06.011

Powerful Society: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Employment in the Ara of Sharing Economy

JIAO Ruo-shui^{1,2}

(1.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Lanzhou University, Lan Zhou 730000,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andzhou University, Land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Employment is the indicator of the economy.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heralds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flexible employment. At home and abroad, there are three viewpoin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ring economy and employment: working opportunities increased and decreased in different areas, and working position replaced. Based

收稿日期:2018-08-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展分享经济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问题研究”(16ZDA082)

作者简介:焦若水,男,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经济社会学研究。

注: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高怀阳与侯顺斌对本文亦有贡献。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hase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shared econom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shared economy on China's employment system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it leads to a large number of low-skilled laborers to be unemployed. Second, the shared economy is mostly elastic which results i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loyment. The third is that the shared economy poses challenges to the employment security system. The main crux of the impac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on employment is that it does not form a society that can engage in dialogue with the markets and capital. Safeguarding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aborers can create a bala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ffective market, and thus helps to create a strong society.

Key words: sharing economy; flexible employment; powerful society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49205亿元,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716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131万人,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数量的9.7%^[1]。在全球经济低迷、经济转型艰难的背景下,共享经济在中国的耀眼增长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绝非一枝独秀。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共享经济正在引发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不但在理论层面颠覆了诸多传统社会科学范式,还深刻改变着全球范围的资源分配与生产消费方式。

就业是经济的风向标。共享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广受追捧,无论是应对失业率高居不下的现状,还是发掘发展经济的人力资源,关注点都在通过共享经济挖掘就业的巨大潜力,所以共享经济亦有 gig economic(零工经济)之说。弹性就业和个体经济正在变为英国劳动力市场的长期趋向,官方数据显示有高达450万劳动力灵活就业,且以年30%的速度增长^[2]。作为全球共享经济发展的领导者,中国共享经济在医疗、服务、教育、旅游四大行业中发展迅猛,空间、物流、自媒体、二手和私厨等潜力行业相继兴起,平台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共享领域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快速扩大。而且,“泛共享经济”形态已经成为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征:不再局限于西方发展过程中关注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连接剩余资源的问题,而是创造性地以共享经济的模式和理念,培育多领域新兴业态和消费增长点,促进传统经济转型升级。然而,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共享经济繁荣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冲击着传统的就业体系,导致大量传统行业人员失业。如媒体广泛报道的共享单车人为破坏事件,表层原因是道德问题,结构性原因则是被共享单车砸了饭碗的群体——如依靠修、卖单车为生的个体经营者、摩的司机、出租车司机等的就业受到摧毁性打击,共享单车兴起后,70%的黑摩的司机不得不考虑转换工作^[3]。

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共享经济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的重要支撑。国家《“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不断拓展新兴就业领域,支持共享经济中新型就业模式的发展。共享经济既是重大实践问题,也是重大理论问题^[4],如何解释共享经济与就业的因果关系,是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迫切需要回答的关键议题。

二、创造还是毁灭:共享经济与就业的文献述评

在经济学史上,新技术的发展对劳动力就业市场影响的讨论不绝于耳,基于新技术和互联网发展而产生的共享经济对全球范围的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挑战。国际劳工组织认为,更加具有弹性、工期更短的工作模式会在不久之后的劳工市场中替代传统稳固的雇佣关系模

式。学术界关于共享经济与就业关系的观点可以分为三类:

(一) 共享创造工作

共享经济一词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在美国提出时,美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滞胀,共享经济故事一开始讲的绝非信任,而是绝望^[5]。共享经济在美国的再次兴起,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失业率上升的结果。美国经济史上互联网的兴起显然与就业紧密相连,研究界深入分析了互联网创造就业的因果机制。大卫(David)等认为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对于从事日常性工作的劳动者是替代关系,而对于致力于问题解决、复杂性问题的沟通和信息密集型任务的劳动者而言则是互补的^[6];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分析,毛宇飞和曾湘泉分析了互联网的使用对中国女性就业的影响,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显著地促进了女性的就业^[7];邱泽奇、刘世定等认为共享经济填平了数字接入鸿沟,互联网将工业化时代因年龄、性别、低教育程度等制约的“僵化”资产激活,使得原本在工业化时代无法进入工厂的农村老年妇女通过“淘宝店”,每年也能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8]。共享经济对就业产生了很强的正面效应。

(二) 共享摧毁就业

新技术促进发展和工人对新技术的反抗,在经济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现象。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是造成劳动者“技术性失业”的直接原因,马克思批驳了所谓的“补偿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任何对机器排挤工人的补偿都是不充分的。新技术、新设备的运用提升了生产效率,但也减少了对人力的依赖,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工人就把愤恨发泄到了机器上,19世纪初横扫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卢德运动”是对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9]。纵观全球,技术的发展造成大规模失业和工人背井离乡的现象屡见不鲜,法布里斯(Fabrice)等通过对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RBC)的研究发现,正向技术冲击一旦发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高于产出增长速度,就业率会不断下降^[10];阿夫纳(Avner)认为技术进步会造成失业,尤其对于年长者就业冲击会更大^[11];文建龙在解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引起的人类社会不同信息主体之间的信息差异时,提出“数字分离”这一术语,数字分离强化了社会分化现象,给弱势群体带来失业问题^[12];赵景峰提出必须通过就业者改变就业观念,政府采取积极就业政策等,以应对在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知识密集型产业带来的知识结构性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现状^[13]。

(三) 共享导致就业替代交叉影响

共享经济对于劳动力就业具有双重效应,即“就业补偿和创造”机制及“创造性毁灭”机制。一是“资本化”效应,经济增长时期创建一个企业必定会获得收益,更多的企业选择进入市场,从而就业岗位增加;二是“创造性毁灭”效应,经济增长会减少劳动力与工作匹配的持续时间,一方面直接提高了均衡的失业水平,另一方面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以及产品生命周期内的利润减少,造成人力资本价格相对上涨的结果^[14]。根据阿克曼(Akerman)等人对2001—2007年挪威公司层面的数据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有利于高技能劳动者而不利于低技能劳动者,使用互联网致使大量低技术工人的工作被取代^[15];宁光杰和林子亮分析了世界银行2005—2012年企业调查数据,发现在使用互联网后,中国企业中高技能劳动者的比例提高,而低技能劳动者比例降低^[16];杨蕙馨和李春梅认为中国信息产业中的技术进步为技能偏向型,信息产业中的技术进步造成了高技能劳动力需求量的迅速上升,相应的,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大量减少^[14]。共享单车这一庞大行业在就业市场中的双刃剑效应就非常典型,一方面极大冲击了传统行业中修、卖单车的个体经营者、摩的司机、出租车司机等群体的就业,造

就了一波新的失业大潮,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一系列共享单车平台管理维护人员、日常调度维修人员等新的就业岗位。

现有的研究与解释为理解共享经济与就业尽管提供了不同维度的解释,但都没有注意到相较于传统单项技术创新的社会后果而言,共享经济对当代中国带来的是核裂变式的共振倍增效应,迄今为止的任何技术革命都没有像共享经济这样迅速地使全球范围的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产生如此深入和彻底的改变^[17]。从信息传导机制来看,共享经济积极发展得益于信息平台的发展,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度,将劳动供给双方的匹配度不断提高,共享经济创造了大量年轻人的岗位,使得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知识结构老化的就业人群再就业难度不断加大;从就业构成来看,新技术革命导致就业形势的多元化,非标准就业规模有持续扩大的趋势,稳定就业比例持续降低^[18]。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的一轮新技术变革破坏了约4000万个传统岗位。《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17年第四季度互联网、电子商务这类新经济行业的就业景气指数高达10.24,能源、矿产、冶炼等传统产业的就业景气指数仅为0.52^[19]。

在什么层次上讨论共享经济的问题,决定着理论如何指导实践,决定着如何制定公共政策,单从技术进步、经济就业维度对共享经济的解释,已经不能适应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域需求。本研究认为,由于共享经济时代是以消费而非生产为主导,那么就不能单纯的将劳动就业看成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应该看成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沿用传统经济学的视角看待共享经济和制定公共政策,不但在就业和经济领域将陷入“无缘共享”的困境,在社会政策选择上也将产生巨大的盲区,放大社会分层与冲突风险。

三、趋利与避害:共享经济与就业的现实分析

共享经济的概念最初是社会学家在1978年提出,现有共享经济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协同消费”或“合作式消费”的概念上^[20]。但是,却往往忽视这一理论提出的社会背景: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后,美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罕见的“滞胀”危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共享经济的起源就是探寻社会结构问题。滞胀危机给美国经济与社会以沉重打击,引发人们对以往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思。凯恩斯主义风光不再,萨缪尔森、托宾等新古典综合学派兴起,其主要特点是既尊重市场自动调节,又强调政府对经济“宏观需求管理”的调节,核心目标直指刺激社会总需求和增加就业量。

虽然,中国共享经济发展的背景与路径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仍然需要将共享经济放在整体性的社会结构中分析,研判其可能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其在社会经济转型中发挥正功能方面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 有效市场还是第三次市场化浪潮?

1. 有效市场:富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唯一能带来快速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2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根本目的便是按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已成为世界领先的数字投资和应用国。中国电商交易额从十年前不足全球总额的1%,到如今的超过40%。2016年,中国与私人消费有关的数字化支付交易额达到7900亿美元,是美国的11倍。世

界上262家“独角兽”公司中,中国公司占其中的三分之一。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市场体量作为支撑。2016年,中国有着7.31亿互联网用户,高出欧盟和美国互联网用户人数的总和,阻碍中国进入互联网世界的数字鸿沟在硬件上已经填平。中国政府“先试水、后监管”鼓励创新的态度是中国数字化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智能手机、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社会征信、数字货币的全体业态正在逐步形成,这将为共享经济奠定了实现基础,如何在这一转变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提升就业质量就显得尤为关键。

2. 过度市场化与资本主导下的伪共享。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主义逐步占据主流并得到巩固,造就了经济领域的发展奇迹^[22]。然而,发展主义隐含着如贝尔所言“由工具理性带来的贪婪攫取性”的社会后果^[23]¹³⁴。社会被视为市场盈利的资源,这意味着社会的运转只是市场体系的附属品^[24]¹⁹。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过度商品化的结果就是灵活就业的增加。资本通过增加更加灵活的劳动安排,以掩饰工人获得社会权利的机会降低的事实。灵活用工的增加实质上就是一种在资本、国家和劳动失衡情况下的劳动力商品化的复兴^[25]。在市场化的第三次浪潮中,许多以往没有进入市场的东西,现在也进入了市场。这种经济去除了以往社会生活中的亲属、邻里、村落和宗教等联结,颠倒了以往经济和社会间的关系,把社会变成了市场的附属品,将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嵌入经济体制中,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市场渗入到社会领域中。更可怕的是,在第三波市场化浪潮中,政府帮助市场扩大市场范围^[26]。

如果任由资本扩张市场的边界,而不予以平衡,那不仅会对我国就业市场产生巨大冲击,破坏就业生态,也会阻碍产业的发育和高级化,从长远来看,将削弱国家能力,并对全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产生消极作用。

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以34520亿元的交易额和比上年增长103%的增速,将实体经济甩在身后,且预计未来几年都将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目前我国的共享经济的诸多领域只是资本操纵的概念炒作,风投主导甚至连大众持股参与的机会都排除出去,摧垮了普通劳动者参与共享的机会,将共享的社会基础扫荡而尽。如Uber为了占领市场损耗接近26亿美元,但直到现在依旧也没有找到真正的盈利模式。而不能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那些在共享经济中涌现出来的“独角兽”企业为了实现先期投资的效益,必定会在司机收入中分成,这将对庞大的从业司机变换花样的剥削。调查显示,现在从业的滴滴司机并非原本宣称的“零工就业”,主要分三类,一类是高补贴时贷款借钱买车加入滴滴的职业司机,另一部分是通过缴纳2万元保证金获得合作汽车厂商新车的签约司机,他们是滴滴“伙伴创业计划”的成员。最后一小部分,便是那些不为赚钱只为好玩的游击车主。换言之,滴滴更像是互联网版的出租车公司。不仅如此,有庞大资本后台的滴滴对中小城市出租车行业就业带来了致命冲击。而人所共知的“共享单车”行业,更是逐渐变成几家“独角兽企业”垄断的航母。

共享经济日益改变着传统的工作方式,导致就业质量不断下降,兼职、不稳定的“自由工作者社会”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各种层次的劳动者被裹挟其中,被迫成为“兼职工人”“永久性临时工”或者“失业者”,劳动者经济状况逐步恶化。共享经济似乎可以利用闲置房屋或劳动力等资产,但它实际上损害了酒店业员工的利益,由于行业不景气,欧洲一些酒店正在裁减员工^[27]。

在共享经济的推动过程中,对于可以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人是自由,对于没有能力或根本没有知识的人便是厄运,稳定的就业机会一去不复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但是,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为近40年经济高速发展做出贡献的这些底层劳动者,长期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享受着水平极低的社会保障,而当前的共享经济创造的岗位对知识、技术、技能有更高

要求。

(二) 有为政府还是国家失败?

1. 有为政府:弹性就业的公共政策保障。在福山看来,国家能力、法治和责任制政府是新全球化时期国家实现善治的三个关键条件,政府在共享经济中如何发挥正面功能至关重要^[28]。中国自2009年起开始的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政策创新,在共享经济时期正在显现出巨大的制度优势,新技术的助力与试点改革的精明改革方式,更有可能将其所具有的正面功能充分激发出来。如自2016年12月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滴滴合作的移动出行专项帮扶活动,由滴滴平台通过提供3000万元现金等帮扶措施,促使大量因为去产能、长期停产停工而丧失工作岗位的企业员工和其他无业人员转向从移动出行行业中寻找就业机会^[29]。

2. 共享经济对就业与社会保障的结构性冲击。以《伊丽莎白法案》为代表,在“罗斯福新政”基本成型时期,当代西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就在于回应工业化后市场“入侵”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23]⁸。以全职就业为根基的雇主制度,通过固定的雇主雇佣员工并为之担负社会保障金来维持工作和退休后的福利,通过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工会规范劳资关系,在过去构成了政府的基本责任。不过,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型经济正在摧毁通过革命与长期抗争形成的社会安全网。共享经济更像是一场为了逃避监管而发起的运动,挑战世界各国政府制定的规则,要把放松管制的自由市场扩大到我们生活的新领域^[30]。

不同于以往的“共享经济下的就业”模式,平台下全日制的工作是一种“全日制工作+互联网”的形式。脱离传统雇佣关系且难以进行身份界定的自由职业者们的社会福利保障极其缺乏。共享经济平台将这些新兴职业者视为自担风险的合作者、承包者,拒绝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巧妙地避开了企业的失业保险、工伤补偿、退休金、产假和其他福利责任。现有法律法规不适应共享经济发展要求,共享经济中弹性就业群体缺乏法律保障。由于新经济重塑了生产、交易和物流等环节,使劳动者受雇于多个市场主体。自我雇佣、工作时间碎片化、收入多元化已经成为新经济下就业劳动者的特点。“互联网+”劳动争议也不断增加,以北京海淀区为例,2014年只有8件,2016年猛增到1400件,涉及行业广泛,种类繁多。弹性就业者的权益并不能通过《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政策得到相应的保障,一旦发生劳资纠纷,共享经济中的就业者很难依法维权。此外,由于共享经济利用的是全球范围的资源,许多在线人才平台、弹性职业者和客户分别来自不同国家,法律适用与权益维护难上加难。

市场改革带来了利益主体与利益诉求多元化、资源配置非均等化和市场失灵等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有一个有效市场,也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发挥再分配能力、市场监管能力和利益整合作用^[31]。当前,政府应充分分析平台就业特征,不断创新制度设计和多元化社会保险形式,以满足由于共享经济就业在劳动力市场的比重不断提高形成的弹性就业人员需求增加的现状。完善适应新就业模式特点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明确制定支持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政策,才能最大化的激发就业潜力,处理好就业灵活性和劳动权益保障的平衡问题。

(三) 资本驯服社会还是有力社会?

1. 被资本驯服的“24/7社会”。全球化在改变以民族国家建构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更为迅猛地改变着社会的基本构成与运行状态,人类生命被裹挟进了没有间歇的持续状态,人类社会甚至进入一个睡眠终结的“24/7社会”^[32]。资本的稀缺性和劳动力的相对过剩致使“强资本,弱劳动”的市场化情形,结果,劳工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劳动保护严重缺乏。这些问题貌似是市场因素造成的,

实际上,政府的不作为和社会的长期缺位才是真正的原因。西方国家通过工会和政府对于劳工进行的保护导致福利依赖与资本外逃,而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形成则与相对较低的社会保护不无关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从国际环境来说,自由市场政策进一步推进,西方国家也从政治、经济方面打压工会,通过资方推行“人力资源管理/员工管理”模式等缓解劳资对立,和传统工会组织争夺工人阶级认同,美国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大幅下降,工会影响力日益式微。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状况不断恶化,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也日益趋向分化^[33]。市场开始与社会“脱嵌”,逐渐侵蚀着国家、工会、社会等力量,使得“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实现更加困难,加剧了就业危机、贫富分化和结构性的不平等。

2. 有力社会:实现自由人的联合。网络社群是共享经济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支撑共享经济的数字化分享平台,本身就是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创新相结合的产物。这些技术创新成果之所以被发展为共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草根社会群体(具有公共价值关怀的群体)对这些信息技术成果的革命性利用^[34]。“共享经济”的兴起,使得草根创业者使用互联网进行直接交易成为可能,并且还会降低投资成本。“共享经济”同时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生活方式,新生代的活力被释放,万众创新热情高涨^[35]。大公司批量生产模式已不再符合日益细化的人民需求的时代潮流,未来更多需要的是个性化产品,但个性化产品由于生产规模太小,大公司顾及成本而不愿生产。由此可见,强烈的市场需求必然会催生新形态的制造业,即一种人人能参与、人人皆是制造商、人人可生产硬件的制造时代将会到来。通过增强系统中的资源分享,促进各部门和单位间摒弃以往的封闭意识,进而避免资源的重复配置与浪费;持续强化系统中的资源共享,现有潜力得以被深度挖掘的同时提升了资源的使用效率;提升系统中的资源整合程度是减少组织成本,提高创新创业效率与质量的有效方式。创新创业的扩散能力通过共享机制建立的协同机制得到巨幅提升,任何一个微小的创意都能通过获得最大可能的扶持而最终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今天能够实现,得益于知识技能分享平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凭借自身资产和知识技能轻易可以获取更加多元化就业机会及多途径的营收的可能,个人的价值充分得到市场化变现。在医疗、科研等领域,允许多点执业和兼职兼薪,即使现有的就业资源极大放大,又使个人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市场化变现,真正实现人尽其才。互联网平台将医疗全过程中的资源供应和匹配、管理与输出进行数据化、智慧化处理之后分享给社会公众,最终实现快速、有效、精准的个人化健康管理。

总之,如果不能构建起有力社会对政府和市场加以制衡,市场不会有效,政府也未必有为。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创新,如任由资本和政府权力的迟钝调控,就业将不断受到冲击。只有建立起有力的社会,对冲动的资本和迟钝的政府形成倒逼机制,促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的发挥,才能应对共享经济对就业的冲击。

四、迈向有力社会:社会、政府和市场新型生态的构建

波兰尼在他的著作《巨变》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是由两个方向相反的力量驱动的:一个是发展社会保障的努力,另一方面是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只有将变迁的速度与人们适应的速度相比较才能决定何者可以视之为变迁的净结果^[24]¹⁷。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长程运动中发生深刻变化就是发达国家从强调社会保障转向强调释放市场力量^[36]。全球化浪潮使国家权力和资本携手推进商品化,

这一急剧扩展的进程使经济和政治领域极大地膨胀起来,挤压了社会领域。疏离的社会关系使得社会溃散分裂,个体原子化趋向明显,大众已无法通过沟通和讨论去挑战市场对于社会的支配,使“保卫社会”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核心议题^[37]。不过,在中国市场转型期的独特背景下,由于以往的“再分配体制”从根本上压抑了自组织的社会生活,因此,“生产社会”而不是“保卫社会”成为第一位的任务^[38]。共享经济对我国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冲击与改变是结构性和全局性的,如何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治理体系迫在眉睫。

第一,创新社会保护与劳动保护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社会保护与劳动保护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大明确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形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占法定覆盖人群的90%,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已实现全民医保。但共享经济产生的就业挤压与就业替代问题,对我国就业困难人群的负面影响与冲击更为尖锐。

劳动者素质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技术技能人才短缺的矛盾日益加剧,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更加困难。再加上中国超过9亿劳动年龄人口的压力,每年在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超过了1500万人,登记失业人员还有近千万,每年还有300多万的新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这就要求我国在下一阶段的社会保障与就业体系建设中,适应劳动者多层次就业的需求,健全专业化、智能化的服务体系,提高劳动力匹配的效率,避免就业结构两极化对社会经济的冲击。政府应修改、调整相关规定,将非正规就业和共享经济中的新就业形态逐步纳入规范化劳动关系管理体系,进一步明晰劳动关系中多元主体的法律地位,规范劳动关系确立、界定、实现形式等内容。加快在家政、快递、外卖、送货等非正规就业比较突出的领域开展试点改革,建立工商、税务、社保等各部门数据分享与监管服务平台。从发展型社会政策建设的角度来看,还需要努力提升劳动者数字化应用等专业技能,弱化“技术性失业”对就业与社会保障带来的挑战。

第二,补齐共享经济发展的社会建设短板。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是共享经济的核心。共享经济的目的是创建一种高效利用、低成本的广泛连接、以合作为核心的新型社会组织系统,通过合作冲破建立在竞争/淘汰机制上的现代社会等级制度。西方社会学家甚至认为,如果说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人类理想,共享模式则可看成是21世纪的政治典范^[5]。

从我国共享经济发展的生态体系来看,支持共享经济包括企业一个人(B2C)的以租代售、企业—企业(B2B)从消费到生产的分享、个人—个人(C2C)完全竞争市场回归、个人—企业(C2B)众包和众筹等全体系的经济形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共享经济健康发展需要抑制资本驱动对就业与社会的冲击,激发共享经济发展的社会潜力,增进社会大众从共享经济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机会,提升对共享经济参与者与消费者的法律与社会保护体系。这一体系既要能够有效应对共享经济带来的数字鸿沟对我国现有社会分层恶化的问题,建构对排斥在共享经济之外的就业弱势群体的保护体系,又要精准利用共享经济的大数据运算优势,引导共享经济更好服务社会良性运行机制的构建。从长期目标来看,构建适应共享经济的社会治理体系,特别在社会信任体系建设上发挥共享经济的大数据平台优势,推进社会信任建设,形成一个能够制约市场与国家失效的有力社会,逐步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力社会三者的平衡^[39]。最终实现与共享经济相适应的共享社会新形态。

第三,面向共享经济重塑社会信任。共享经济的发展史,也是人类信任变迁的发展史。通过全球范围的网络互联与数据互联,社会信任机构与机制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迁。人们将越来越多的信任交给

了在社交网络上遇到的陌生人,信任被“转向了分散、互联的社群”。新古典经济学在对合作进行过完美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在公地悲剧、搭便车与囚徒困境等市场失灵情况下维持社会合作秩序的机制进行了反复的假设与思考,认为发挥极其重要作用的三个因素是重复交往、声誉以及制度约束机制^[40]。归根结底实际上就在于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机制的建立。

没有共享就没有真正的征信,只能说是孤岛化的信用数据。共享经济是立足于互联网和平台大数据的应用,互联网与大数据正在将困扰古典经济学未能解决的信任黑箱逐渐打开,并用可视化的移动LBS应用、动态算法与定价、双方互评体系等一系列形式呈现出来,共享经济打开的是一个看得见的网,这一网络为全球范围陌生人之间进行互动交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障约束机制。促进共享经济社会效用发挥的重要方向将是金融征信、商业征信和行政管理征信三大体系的共享融合发展,形成全维立体数据体系。这一体系的建成,不但解决了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信用信任难题,而且将为我国社会信任体系的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帮助。

参考文献:

- [1] 国家信息中心.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 [EB/OL]. (2018-02-27) [2018-03-08]. <http://www.sic.gov.cn/News/250/7737.html>.
- [2] 199IT. 英国商务部最新分享经济调查报告 [EB/OL]. (2016-02-25) [2018-03-18]. <http://www.199it.com/archives/441321.html>.
- [3] 199IT. 摩拜单车:2017年共享单车与城市发展白皮书 [EB/OL]. (2017-04-20) [2018-03-18]. <http://www.199it.com/archives/581592.html>.
- [4] 潘格格,刘爱莲. 论共享发展理念及其时代意义 [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42-47.
- [5] MONIQUE D. Sharing Economy: How the Wind of Trust Has Changed Direction [J/OL]. Paris Innovation Review,2015(5):12-21 [2018-03-8]. <http://parisinnovationreview.com/article/economie-collaborative-le-vent-de-la-confiance-a-change-de-direction>.
- [6] DAVID H, PRANK L, RICHARD J M.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4):1279-1333.
- [7] 毛宇飞,曾湘泉. 互联网使用是否促进了女性就业——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分析 [J]. 经济学动态,2017(6):21-31.
- [8] 邱泽奇,张樹沁,刘世定,等. 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 [J]. 中国社会科学,2016(10):93-115.
- [9] 钱乘旦. 卢德运动新探 [J]. 南京社会科学,1991(2):84-88.
- [10] FABRICE C, HARRIS D. Technology Shocks and Employment [J]. The Economic Journal,2007,117(10):1436-1459.
- [11] AVNER A, JOSEPH Z.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arly Retirement [J]. The Economic Journal,2010,121(1):171-193.
- [12] 文建龙. 信息分化与弱势群体问题 [J]. 理论导刊,2005(8):21-23.
- [13] 赵景峰. 网络经济下的就业理论和就业治理 [J]. 理论探讨,2002(2):41-43.
- [14] 杨蕙馨,李春梅. 中国信息产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及工资差距的影响 [J]. 中国工业经济,2013(1):51-63.
- [15] AKLRMAN A, GAARDLR I, MOGSTAD M. The Skill Complementarity-of Broadband Internet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5.
- [16] 宁光杰,林子亮. 信息技术应用、企业组织变革与劳动力技能需求变化 [J]. 经济研究,2014(8):79-92.
- [17] 焦若水,高怀阳. 共享经济:范式革命与中国叙事 [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3-22.
- [18] 曾湘泉,徐长杰. 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J]. 探索与争鸣,2015(8):32-35.

- [19] 东方文创. 2017年第四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EB/OL]. (2018-01-17) [2018-01-21]. <http://shcci.east-day.com/c/20180122/u1ai11163141.html>.
- [20] FELSON M, SPEATH J 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78, 21(4): 23.
- [21] 韦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再反思[J]. 探索与争鸣, 2015(1): 58-63.
- [22] 郁建兴, 关爽. 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J]. 探索与争鸣, 2014(12): 7-16.
- [23]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严蓓雯,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134.
- [24] 卡尔·波兰尼. 巨变: 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 黄树民,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9.
- [25] 王金秋. 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J]. 当代经济研究, 2017(1): 41-48.
- [26] 麦可·布洛维, 郑翔. 公共社会学[J]. 社会, 2007(1): 192-200.
- [27] 史蒂文·希尔. 经济奇点: 共享经济、创造性破坏与未来社会[M]. 苏京春,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32.
- [28]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 毛俊杰,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3.
- [29] 陈杰. 创1750万灵活就业机会滴滴造就第一就业平台[J]. 中国科技财富, 2017(1): 74-74.
- [30] 汤姆·斯利. 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M]. 涂欣,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 24.
- [31] 张曙光, 黄万盛, 崔之元, 等. 社会经济在中国: 上[J]. 开放时代, 2012(1): 5-42.
- [32] 乔纳森·克拉里. 24/7: 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M]. 许多, 沈清,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5.
- [33] 杨典, 欧阳璇宇. 第二次大转型: 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C]// 年会会务组. 中国社会学2017年年会论文集汇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5.
- [34] 王宁. 分享经济是一种改良运动——一个“市场与社会”的分析框架[J]. 广东社会科学, 2018(2): 168-183.
- [35] 王喜文.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共享经济[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5(11): 12-15.
- [36] 高柏. 日本的经济悖论: 繁荣与停止的制度根源[M]. 刘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5.
- [37] 赵环, 高丽, 徐选国. “为社会的经济”: 社会经济的西方传统及其中国路径[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25-37.
- [38] 沈原. 社会的生产[J]. 社会, 2007(2): 170-191.
- [39] 亨利·明茨伯格. 再平衡社会[M]. 陈维东, 鲁强,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91.
- [40] 张康之. 合作社会理论的构想——评罗尔斯的社会合作体系[J]. 南京社会科学, 2008(1): 72-78.



(责任编辑 彭何芬)